

回答

答三位老师

思 沁 夫

能够得到你们的建设性的意见非常感谢。对我今后的研究非常有参考价值。

如概要所述，本稿并非是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抛开个人的专业，兴趣和爱好，“现代中国研究”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呢，又，超越国境来看，我们形成了共有的认知的公共空间了吗？对于这些课题，若能引发一些启示的话，我将非常欣慰。

1. 给中山龙一老师的答复

非常感谢您细心地为我们整理了有关风险的一些理论。中山龙一老师的评论非常明确且具有指导性，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 NGO和地方的关系

在中国，与地方政府的对立，几乎是问题的全部，在这里我想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为一个焦点来谈一下。可以这么说，NGO（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状况非常严峻。中山老师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已经谈到，在中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地方政府无视法律和条规，不按规则，章程地来停止，阻碍 NGO 的活动，或者把 NGO 从行政管辖范围内驱逐出去等事情是很普遍的。

本来中国的 NGO 组织就不是独立的。在中国要设立 NGO 需要政府的许可,同时在成立后需要被置于政府的监视下。进一步来说,中国的 NGO 是在政府的管理下而进行活动的。具有政治上的约束,若不取得政府的许可就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还存在经济上的制约(募集资金困难等)。

我在此着眼的是,从全世界来看,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中国的 NGO 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有更多的 NGO 在中国开展活动。我强调了“草根民主主义”是“第 3 条道路”。是因为在中国若声称“民主主义”的话,会立刻引起过敏反应。从大的理由来区分的话,我想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首先,致力于环境的 NGO,是着眼于人们的生活、健康及下一代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问题。在中国这是谁都希望解决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居民的生存问题。开发独裁主义在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上走入了死胡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落差,失去了民心。2012 年自然之友(中国最大的环境 NGO)以全国 15 个城市,5000 人为对象,实施了问卷调查。结果,排在人们现在最希望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位是干净的水和空气(92%),第 2 位是安定的生活(89%)。

尽管这是个人的理由,但即使是处于困难的状况下,也需要具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魄力。此外,解决所需要的问题的目标化和目的化的方法论也是不可欠缺的。而且,我强调了作为全球的环境风险的中国环境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他(她)们正在进行致力于东亚的公共空间以及共同(共生)的价值观的创建的实践。

我觉得实践胜于理论。究其原因,实践并不是为了学会,而是为了社会。对于使用税金,为自己及学会搞研究的我们来说,是需要反省的。即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又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2) 关于地域所独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与量化的方法

也许我未完全理解好中山老师指出的地方。与其说是从地域所固有的历史、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得到为了使考察和量化的方法的使用兼得的具体方案,倒不如说我想问的是,是为了地域的研究和实践还是为了研究和项目的成果。还有一个想强调是,此次把柳田国男的东北论和西田几多郎的生命哲学作为了分析的基础。

我想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1990 年代结束的时候，因为在日本市场松茸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在中国的云南省白马雪山国立保护区，引发了“松茸热”。保护区内的居民及周边的居民蜂拥而至，结果短短 5 年间就被采摘一空。

着眼于解决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 NGO（以下称为 A）和瑞士的环境保护 NGO（以下称为 B）奔赴当地。并且为了各自的项目成效，开始寻找赞同该项目并能提供协助的村落。

A 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地人环境保护意识低，不能养成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的习惯。由 A 来作为主体，首先导入环境管理体系，同时把他们当中的学历在高中以上者作为对象，进行培训。把经验和方法等教会他们。在五年后把全部都移交给当地人。他们建造了这样一个体系。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还是轻视了当地人的需求及习惯等。

另一方面，B 和 A 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手段，明确了当地 9 成以上是藏民族，每天都有很多人到寺院的两个村子。他们从努力修复寺院开始，和当地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通过和当地的村民的交流，僧侣们明白了 B 的意图，村民们也信任了 B。B 得到了僧侣的帮助后，以 2 个寺院为中心展开了环境教育活动。尽管说是环境教育，但实质性内容几乎都是藏传佛教，他们的习俗及禁忌等内容。进而实现了把当地人组织起来，实现从松茸的森林的乱变为用自己的手来保护。以此同时，在采摘松茸的时候，使用大型的计测器（小的话，无法采摘）。开发节约木材的取暖炉等。开发了 11 个以上的应用技术，即“地区性技术”的开发。从项目开始经过了 5 年，自然环境得以改善，到第 7 年的时候，松茸恢复到了开发前的水平。

A 失败了，B 为什么会成功呢。我验证过。简单地说，B 的成功并非是对彻底的地方主义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外部评价及判断。而是从当地出发，并且尊重当地人及他们的意见及想法等，帮助他们走向目标的道路-方法。

A 也试图控制木材的消耗量，依靠镇上的企业，尝试导入节能的取暖炉，但是，1 个 850 元（本来的价格是 1100 元，在当地居民购买的时候，项目组提

供了 250 元的补助金), 这个价对当地居民来说, 还是非常高额的, 因而未能普及。

不同的取暖炉的一个月的木材使用量的比较

当地人以前使用的取暖炉: 1500 ~ 1800 公斤

A 开发的取暖炉: 700 ~ 800 公斤

B 开发的取暖炉: 900 公斤 ~ 1000 公斤

如你所看到的, A 的取暖炉是最节约、效率最高的。但是, A 的取暖炉却未能普及。相反, B 却在所有的家庭普及了。为什么呢。因为 B 利用改造现有的取暖炉的方法, 把技术传给了村里的人。改造费是 250~300 元。这样一来, 在村里就能修理了。

理论和方法再美好再合理, 若不能被当地人理解终究没有意义。我到迄今为止所强调的是, 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在理论发展和实践上下功夫。我想强调的是, 理论应当为问题服务, 为实践服务。同时, 要在时间中改造理论, 深化理论。

2. 给江沛老师的答复

我也读过《山坳的中国》。读后也和江沛老师一样, 开始考虑中国的环境问题。再确切说, 《山坳的中国》, 《西部在移民》(1987 年的报告文学) 给了我强烈的冲击, 从而开始考虑环境问题了。现在正在从事西伯利亚的生态研究和蒙古的环境保护活动。但是我对环境问题的关心, 是与我本身, 就是游牧民的出身密切相关。

如江沛老师的指点, 环境问题的深刻化与我们自身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虽然我几乎没有接触原稿, 不仅是政府和企业, 我们自身也怠慢了为了环境的所有活动及行为。中国社会在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换时, 我们的“革命同志”变成了消费大量商品, 即成为消费者。13 亿人的消费大大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环境, 换言之, 我们如“同天斗, 同地斗”和“人

定胜天”的政治口号所象征的那样，从有明确的目的和意识的改造自然的时代，变成了因为追求丰富的生活、并且享受富裕幸福的生活而给自然环境带来恶劣影响的无意识的“环境破坏者”。并且，教养、学问和研究也在大量的消费中苟延残喘。

但是，这种变化并非只带来问题，也可以说我们的关心程度也在提高吧，我们被消费的激流所冲击，是不是已经麻木不仁了呢。在我的稿件的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了两个美国人。一人是作家，一人是科学家。两人以自己的眼睛和感觉和人生关注中国大地，并在文学作品，有机农业方面结出丰硕的成果。所以我想问，我们为成果主义所左右，是不是反而弄丢了更宝贵的东西呢。也就是说，2个美国人对我们的“控诉”，是不是我们连自己的眼睛都不能相信了呢。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土地问题牵连中国的命运，不对，可以说是牵连亚洲的命运也不为过。如果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亚洲、对世界都存在高风险的话，那么，风险的核心就是土地。很偶然，在100年前，这两位美国人，在土地问题上为我们留下了富有教育性的思想和榜样性的实践。

3. 给潘宗亿老师的答复

如潘宗亿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个本土化还是国际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亟需我们做出选择呢。

我们的环境问题已超出地域范围，也就是说，应该“作为全球环境风险”问题来把握。关于此，我想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在此我想问的是，尽管我们面临的问题变化了，但我们的应对姿态却几乎没有改变。实际上，研究被国家的框架所束缚，陷入了为了学问而做学问的境地。

我们拥有的问题，被批判，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带有风险的状况，但即便如此，就能超出我们的责任范围吗？我们还有学习一门新学问的勇气吗。“草根”运动正在实践上述的指点与内容。当然，问题堆积如山，不确定的内容也很多。那么我认为应该是从个人出发，又回归个人。也许没有解答问题。但是，但是背负风险勇气却不可缺少。

总之，我想强调的不是学问上的问题，而是，我们进行选择，价值判断的时候，是应当把自己摆在前面，或学科摆在前面，还是，社会性问题摆在前面。当然这不是选择了 A，就必须放弃 B 的问题。有时我们需要妥协，有时需要我们放弃很多的东西，作出牺牲。当我们拥有了共同的公共空间，以上的问题就是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它就是个人问题，也许是人格问题。